

我心目中的日本—書評

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



*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

盧千惠作者簡介

1936 年出生於台中，1955 年台中女中畢業後，通過留學考試，前往日本。1956 年進入國際基督教大學 ICU 就讀，1960 年畢業，並當該所大學助教。

1961 年與留學早稻田大學的許世楷結婚，並進入國立御茶水女子大學研究所專攻兒童文學。

1992 年黑名單解除，回到睽違 34 年的台灣。隔年，正式返台定居，在玉山神學院、台灣文化學院教授兒童文學。

2004 年隨同擔任駐日代表的夫婿再次赴日，以代表夫人身分，從事各種文化交流及公益活動。

日文著作有：《吳鳳》（小熊社）、《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》（濱野出版）。

漢文著作有：《台灣人的歷史童話》共五冊（自立報社出版部）、《盧千惠文集》（前衛出版社）、《台灣君回台灣》（東方出版社）、《有故事的世界人

權宣言》(台中國際特赦組織)、《給孩子們的台灣歷史童話》(玉山社)。

譯作有：《剛達爾溫柔的光》、《小鴨艾力克》(玉山社/星月書房)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作者簡介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。

鄭清清譯者

文化大學日文系畢業，曾任雜誌編譯、編輯。著有《悠遊城市心》(新雨出版社)、《不做 Number one, 只做 Only one》(水瓶世紀)。譯有《活出自己永遠美麗》(洪健全基金會)、《美女入門》、《夏日溫柔的故事》(以上兩本新雨出版社)；《阻礙孩子成長的父親》、《如何激發自我潛能》(以上兩本生命潛能出版社)等 30 餘本書。現與外交人員夫婿旅居日本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譯者簡介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。

前言：

台灣人執政用的心思會是一種用生命想達到的境界，中國黨的阿九心中只有中國，對台灣人民的感情，則是一種中國殖民台灣的記憶。

有關台灣和日本之間的交流，較近期、同時也讓人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應是 2006 年 8 月 19、20 日在台北小巨蛋所展開、為期兩天的日本大相撲台灣巡迴公演。為了那次的演出，光是架起相撲比賽場地的屋頂、從日本運來鋪在相撲比賽台上用的沙和挖土機，就花費了 1,500 萬日圓。那次赴台參加比賽演出的幕內力士，共計有 42 位。

在台灣舉辦日本大相撲巡迴公演，自戰後以來這可是第一次，距離上次的 1936 年，足足隔有 70 年之久。在可容納一萬名觀眾的會場，兩天來均是坐無虛席。由於在台灣平時便看得到 NHK 轉播的日本相撲比賽，現場許多觀眾對相撲選手自然是耳熟能詳，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人，更是占了觀眾的絕大多數。

在那天的台北比賽現場，人氣最旺的要屬橫綱朝青龍、大關琴歐洲、以及千代大海了。特別是大關千代大海，當他接受記者訪問，說出其實自己的外祖父是台灣人時，人氣指數更是扶搖直上。談起自己曾是飛車黨老大，差點兒就被送進少年感化院，最後救他回頭的是母親一句「我相信我的兒子，他並不是真的壞蛋！」的肯定話語。千代大海侃侃而談的專訪在電視節目中播放後，台灣民眾一下子為千代大海瘋狂起來，也因為如此，當公演當天場內廣播以台語喊出「千代大海」，並介紹說「大關的外祖父是台灣人！」時，隨即出場千代大海馬上受到在場民眾的熱烈歡迎，現場並響起一片「台灣加油！台灣加油！」的聲援聲。

為促使日本大相撲得以到台灣舉行公演，外子許世楷可謂是煞費苦心，做了很大的一番努力。我們夫婦二人因被列入黑名單無法踏入台灣國門，長久旅居日本，並在津田塾大學教書，因此對日本可說是相當熟悉。除了大相撲之外，他還有不少其他促進台日交流的好構想。譬如日本電視節目「開運鑑定團」，若能到台灣舉辦鑑定大會，想必一定很有趣；又如 NHK 的「業餘歌唱競賽」，我們也已和對方多次進行交涉，如能成功，相信台灣民眾一定會非常高興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3-15。

台灣人在日本受到尊重，在他們的心中有著台灣人的驕傲，中國黨在台灣以踐踏台灣人的自尊為其統治的手段。

陳進女士生於 1907 年，1998 年去世。在她辭世後八年，也就是 2006 年，由涉谷區立松濤美術館為首，在日本各地紛紛舉辦她的冥誕百年紀念展。

出身於新竹縣富裕家庭的陳進女士，自小接受日本教育，高中時並進入當時台灣女性的最高學府—台北第三高等女校就讀。就在那個時期，當時任教於該校的日本畫家鄉原古統先生發掘了陳進女士的才華。就這樣，陳進女士便於 1925 年進入東京的女子美術學校（現今的女子美術大學）日本畫師範科就讀，學習日本畫。

所謂的日本畫，不同於明治以後傳入日本的西洋畫，乃是依循日本固有的技法樣式，使用墨或礦石為顏料，將膠混合於其中，以毛筆沾之在和紙或絹上作畫。

陳進女士自美術學校畢業後，便師事於鏑木清方及伊東深水兩位老師。剛開始她畫的多是身穿和服的女性，不久在意識到自己為台灣人後，其想法亦同時表現在她的畫作上，開始畫穿著漢人服裝的女性或原住民女性。結果她的畫作受到了高度的評價，在帝展（日展）和台展中多次受到入選的肯定。

不過陳進女士並不因此而灰心，聰明的她，將日本畫的名稱改為「膠彩畫」，不但繼續作畫，同時還指導起後輩，讓膠彩畫流傳開來。堅持膠彩畫創作的她，終於在 1997 年得到台灣藝術家的最高榮譽，獲頒行政院文化獎。

如今，膠彩畫在台灣已自成一特殊風格，並受到重視。而喜愛陳進女士畫

作的人，更是不在少數。膠彩畫能在台灣生根著地，或許也可視為日本文化輸出海外的一個成功例子吧！

讓我們再將目光轉回現在。當下經常出現在電視討論節目中，以話鋒犀利、一針見血為其特色金美齡女士，不但是我和外子 40 多年的好友，也是和我們一起為台灣獨立及民主化打拼的好同志。另外還有一位同志黃文雄先生，在他眾多的作品裡，對中國一貫採取嚴厲批評之勢，是位知名的評論家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6-17。

接著日本生力麵、杯麵之父—安藤百福先生，也是出身台灣，後來才歸化成日本人。2007 年初他以 96 歲高齡去世時，日本各家報紙莫不騰出大大的版面追悼、追思，或評論他的生平。一位企業家的過世，能讓報紙這樣大幅報導，這可是極為罕見的事情。

曾有報章雜誌拿安藤先生和家電之祖松下幸之助先生相比，譽他為速食品之祖。這其實一點也不為過。

如今日清食品的速食製品在全世界的銷售量，一年就高達 850 億份。不只是日本國內對他讚譽有加，就連紐約《時代》雜誌亦曾以「麵先生」為題，在其篇頭發表過一篇社論。就像是其他生產代表戰後日本、具獨創性消費者導向製品的集團，如：本田喜美轎車、SONY 的隨身聽、三麗歐的 Hello Kitty 等，獨力開發速食麵的安藤百福先生，無庸置疑地已受到全世界的肯定。正如在該篇社論中所寫道：「『麵先生』將永遠穩坐在人類進步的萬神殿上。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18。

台灣人要有世界觀，中國黨的阿九只要台灣人走中國意識，永遠成為被中國統治的奴隸。

台灣的畢業生選擇來日本，相對的也有日本高中生在畢業旅行時選擇到台灣。外子世楷和研訂海外畢業旅行的學校、機關單位等相關人員接觸時，即開宗明義地告訴他們：「所謂的畢業旅行，就是要能對自己的國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。」接著，他推薦台灣：「而台灣，就是一個能讓日本人發現自身的好地方。雖然去的是另一個國家，但卻可以在那個國家中，發現到自己祖先從前所做的建設、創下的偉業，和走過的歷史。如果各位期待讓學生出國旅遊之餘，又能對自己的國家有另一層新的發現與認識，請到台灣來。」

世楷又說：

「人生中總有數不清的相遇，這些相遇對年輕人而言，很可能成為他未來漫長人生中工作或學問的基礎。而這些相遇機會，並不限於發生在自己的國家之內，只要有緣，它也有可能發生在國外。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美哉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23-24。

只有日本通的台灣人許世楷，能為台灣爭取公平正義，真不知過去的亞東關係協會在搞什麼碗糕？

免簽證待遇讓台日成為「重要的夥伴」

自 1995 年一月起，日本人進入台灣可享免簽證待遇。也就是說，護照持有人只要其護照有效時間距離到期日超過三個月以上，則自到達翌日零時起算，停留時間在 30 日以內者，可不需辦理簽證。

回顧尚需要簽證的時代，根據統計，台灣在世界各地駐外使館中所得自簽證的收入，以東京為最多，最高記錄曾一天收入 3,000 萬日圓。我們之所以會願意減少這項收入，實施免簽證待遇，主要還是希望能製造更多的方便，讓日本朋友可以輕鬆容易地赴台灣旅遊。

儘管台灣方面對日本提供這樣的便捷措施，但日本並未同時也對台灣實施免簽證待遇，台灣人要想赴日旅遊，依然需要辦理簽證。為此，我們曾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請求，但由於顧慮中國方面的反應，日本政府遲遲不肯答應。就這樣，直至外子世楷就任駐日代表後，開始多方奔走，向多位日本政治家們請託、到日本各地進行遊說工作。

終於，我們的努力有了初步的成果。在 2005 年愛知縣萬博舉辦期間（3 月 25 至 9 月 25 日），台灣人赴日可以免除簽證。雖然時間上受到限制，屬於短期的措施，但卻可說是為日後政策的推動埋下新的契機。

果然，在眾多前來參觀愛知萬博的外國人中，來自台灣的總人數高居第二，僅次於韓國。不僅如此，台灣人的消費能力也是驚人，一人每日平均消費 170 美元。和日本觀光遊台時，平均消費 180 美元相比，可說是毫不遜色。因此，免簽證待遇的實施，事實上並不只是對台灣人有利，日本方面也獲利頗大。尤其是對日本的觀光客倍增計劃，台灣人的貢獻不容小覷。

根據統計，每年日本觀光客訪台人數約有 110 萬人；而台灣人訪日人數，則約 130 萬多人。換言之，每年來去台灣日本兩國間的人數，高達 240 萬

人以上，隨著愛知萬博的閉幕，免簽證待遇也跟著結束，這實在是怎樣也說不過去的事。

所幸在 2005 年 8 月 5 日，也恰好就是日本推動郵政民營化破局前日，台灣觀光客永久免簽證待遇終於立法通過了！這都還得感謝諸多日本政治家，超越黨派的努力協助，才能有此結果。

免簽證待遇對台灣人而言，實在是件可喜可賀的事。高興的並不只在於以後到日本能夠比較方便，或是可以省下約 6,000 日圓的簽證費用，而是台灣日本兩國彼此免簽證，代表著雙方平等互惠。日本承認台灣是他們的重要夥伴，尊重台灣並重視台灣人，這點才是真正值得台灣人高興的地方。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美哉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25-26。

日治期間初期的打壓，對付台灣人民的反日戰鬥，損失不少台灣精英，但是中、末期對台建設由文化到人權、法治、衛生方面的投資非常用心。

國民黨在統治台灣初期打打殺殺，到現在阿九執政一切傾向紅色中國，目無法紀，視台灣人民如賤土。

比起日治時代，國民黨給台灣人又是什麼？

日本存留在台灣的建設不只有鐵路，部份村落的規劃建造也是。譬如，台灣東岸有個名叫吉安鄉的地方，過去它叫做吉野村，原是阿美族人的居地，日本統治期間，將此村做為示範村落，積極推動日本人入住。也因為如此，和其他台灣村落不同，村內規劃整然有序，道路筆直易行，整個村落的正中央是土地公廟，然後是灌溉用的小河。實際到此見過的人，莫不感嘆：「真不愧是日本人所建設的村莊，到處都是這麼地井然有序。」

還有位於接近台灣中央地帶，為台灣最大的淡水湖，同時也是台灣人八景之一的日月潭。事實上，它是當初日本人為了進行水力發電，特別攔截河川而形成現在的規模。當時要進行這項大規模工程並不容易，日本技術師們一個個冒著被牛虻、蚋等吸血蟲叮咬、毒蛇侵襲的危險，篳路藍縷地開墾建設，才得以完成。

此外，還有一位石川縣出身的八田與一技師，在台灣南部的嘉南平原上建造了東洋第一大水壩，及灌溉設施。拜他的建設所賜，這塊以往被人視為不毛之地的土地，搖身變成台灣數一數二的肥沃穀倉。戰後國民黨主政台灣，與日本有關的石碑多被破壞殆盡，所幸八田先生的銅像因被當地居民

藏了起來，才得以逃過一劫。近來這座銅像經過整修，終於得以重新立回原來的地方，而八田先生對台灣的貢獻，也計劃將拍攝成電影，讓台灣民眾知曉。

八田先生最後是在戰時前往菲律賓進行灌溉設施調查途中，坐船遭到美軍潛水艇攻擊，不幸身亡，享年 58 歲。受他建設恩惠的嘉南平原的居民們，為感念他的貢獻，所以將船隻被擊落的那一天——也就是 5 月 8 日——訂為他的忌日，長久供養至今。

還有 46 年以來，一直不斷致力於台灣稻作品質改良，被尊稱為「台灣蓬萊米之父」的磯榮吉教授。即使他在戰後回到日本，每年新米一收成，台灣農民也一定不忘寄給教授，以對他過去的貢獻表達感謝之意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美哉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31-32。

在我們夫婦的故鄉台中，有個為紀念縱貫鐵路開通所建造的大公園——台中公園，公園內有一供老人們聚會的集會場。雖說是露天式的，但有卡拉 OK 等設備，老人們也可以在那兒泡茶聊天。

一次，有位日本友人來到台中，我們便帶他到那兒逛逛，現場一些老人們立刻笑容滿面地圍了過來，甚至把手中的麥克風交給友人，要他為大家講幾句話。

話說這位友人是位大學教授，經常將「日本人過去對不起台灣」的話掛在嘴邊。那天一接到麥克風，他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我本人謹代表全體日本人向各位致歉。」然後深深地一鞠躬。現場的老人們聽了，馬上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：「沒那回事」、「日本人在台灣做的好事也不少，你別這麼說！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美哉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33。

若問台灣為何會「親日」？我個人的想法是，相較於韓國受日本統治 30 幾年，台灣在日本的統治下度過 50 年的漫長時間，讓原本的恨隨著第三代的出生長大，台灣人越來越能感覺得日本人的好。嚴謹又正直、守紀律、對國家盡忠等等，甚至很多地方都受到日本同化了。

當然，日本在接手台灣這塊殖民地初期，的確也採取過高壓統治。一有高壓統治，必有武力抗爭出現。這是不管在世界的哪一個地方、歷史上哪個時代，都會出現的必然結果。所以在那一段時間裡，的確也有不少台灣人因此受到傷害。如我的外公，即因年幼時兄長遭到日本人殺害，而使這記

憶成了他一輩子也難以抹去的心靈創傷；還有日本警察或官吏用傲慢的態度、輕蔑的眼光對待台灣人等等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34。

由於日本人走後，接著進來台灣的國民黨過於專制，使得常有人不禁懷念起日本來，覺得比較之下還是日本人好。日本人守規矩、重法律；反觀之後的中國人，法律是他們用來抓人或處罰人所使用的工具，而非用來約束自己行為的東西。就這樣拿日本人和中國人兩相比較，覺得「日本是個好民族」的想法也就自然應運而生了。

在《文藝春秋》的特別版裡，曾有一個「我所愛的日本」特集（2006年8月臨時增刊號）。其中訪問了52名在日外國人，要大家談「我喜歡日本的○○」。這些訪談最後由前上智大學教師加藤恭子女士集結歸納，所整理出來外國人眼中公認的日本人之美德、長處為：「正直、謙虛、細心、體貼、纖細、客氣、和平」，讀來教我頗有同感。

52名受訪的外國人中，金美齡女士也是其一。金女士語鋒犀利地說了如下一段話：「台灣在戰後那段時間，因感懷日本人統治時代，因此常用日本精神（台語發音）這個的倫理、美德等。不過現在這個名詞的使用，和日本這個國家已經沒什麼關係了。譬如：我們會指著某個台灣人說：『那個人啊！是用日本精神在做生意！』諸如此類的用法。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美哉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35-36。

國民黨執政就像現在阿九執政一般，開始搞小動作，要全民監控台灣建國活動，聽說是國共會談的原則。

要獨自一人踏上旅途，老實說心中不免多少有些不安，但18歲的我，對未來卻又是充滿著好奇。尤其一想到即將要踏上的日本不知道是個怎樣的地方，不知不覺中不安感又沖淡了不少。

我所搭乘的DC6飛機一次大概可搭載50名乘客，那天只有我一人年輕女性。當我正好奇地想拉起窗上的遮陽板時，立刻被空服人員制止，我這才知道，原來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所頒布的戒嚴令中，其中一條竟還包括在未出台灣領空之前，民眾是不可任意打開窗戶眺望窗外的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18歲負笈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40。

阿九執政開始復辟，要洗掉阿扁執政八年的台灣意識，而數十年前的日本寫書著者，皆會考慮給下一代有健康的思維。

記得在進入大學就讀後，有次為了想買一本字典走進一家小書店。令我訝異的是，在整個書店最顯眼的位置上，擺放的竟是兒童圖書。其中有翻譯自國外的，也有日本當代作家的作品，還有古老的故事繪本，種類之多，是我在台灣所未曾見到過的。

信手翻開架上其中一本繪本，裡面的內容再度令我感到驚訝。那是取材自《伊索寓言》中「螞蟻與蟋蟀」的故事，但它的結局發展卻完全不同，讓人耳目一新。

「在被暖爐的火烘得暖和和的屋子裡，餐桌上擺滿了豐盛可口的食物。勤勞的螞蟻媽媽倚在門口，用溫柔的口吻，微笑地對著整個夏天耽於玩耍的蟋蟀說：『請進來我家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吧！』」

這和原本的《伊索寓言》的結尾完全不同，原本的結尾是螞蟻媽媽對蟋蟀說：「誰教你夏天時不好好地為冬天打算？如果你想過，現在就不用受苦了。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18歲負笈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45。

由於ICU是在1953年4月，由日本及北美基督教界的領導人所創立的超教派基督教大學，同時也是日本第一所四年制教養學院大學——我是第四屆學生——所以那次的入學典禮，包括我們新入學的學年在內，總算才湊齊一到四年級；一學年只收150人，在廣大的校園裡，全校學生才600人，研究所學生人數更少，只有幾個而已，為日本少見的少人數制學校。

入學典禮上宣讀〈世界人權宣言〉前文的宣誓儀式，乃是由堅信和平及人權為重建日本的基礎、我們的第一代校長——湯淺一郎先生所發起的。

湯淺校長對我相當照顧，不只是在大學時代，甚至到了婚後，很多事還真多虧有他的幫忙。譬如，當我和外子兩人因列入黑名單不得返回台灣時，他每次到台灣，必定會為我們跑趟台中，見見我們雙方父母；還有在某一次事件中，外子遭日本警方拘留，出面寫陳情書、當保證人的，也是湯淺校長。

身為京都民藝協會會員的湯淺校長，亦十分熱愛台灣民間藝術，經常前往台灣做民藝之旅。如今在ICU的湯淺紀念館內，陳列有蒐集自台灣的各種民間藝品，在他的回憶錄裡也寫著：「置身從北到南充滿民藝之美的王國，令人感動」等字樣，而這些收藏品包括；原住民的木雕、編織的衣物、雜

器、身上的裝飾品，甚至還有聽說是攜自中國的陶瓷器。

湯淺校長從台灣返日後，亦曾將台灣的所見所聞在大學中暢談，甚至寫文章發表在報紙上。

「如今不論國內也好、國際也罷，有關台灣問題的探討甚囂塵上。但我認為，不管如何，最重要的應該是聽聽生在台灣、住在台灣，將近1,300萬名(當時)的台灣本島人民心聲，他們的態度、主張才是真正的答案.....。」就因為這樣的談話，遭當時國民黨政府懷疑他是否和我們這些黑名單人士有所接觸，因此之後便拒發入國簽證給湯淺校長。為此我們感到相當抱歉，欲向湯淺校長致歉時，他卻說：「不！那是因為我的話礙著了某些人。不過，只要是對台灣好的事，我就一定要說，就算此後進不了台灣也沒關係！」校長胸懷之大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18歲負笈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47-48。

台灣人無法做台灣人本身，阿扁執政多數人要做台灣人，現在阿九執政卻要全體台灣人當中國人，中國黨的統治者不理會民意，做中國一統的夢。

1945年，日本因戰敗結束了在台灣統治，在台約有45萬的日本人必須撤離，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班上的同學在內，由於東西很多無法全數帶回，所以有些日本人便路邊將他帶不走的東西一字擺開來賣。那時年紀尚小，並不太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但看見我的好友也在其中，不知怎地，一股捨不得的感覺就湧上心頭，頓時覺得難過起來。

就這樣，學校一直處於停課狀態，直到三年級結束時，才再度開課。

日本人走後，換來中國的國民黨接手統治，清朝時期祖父輩在書房學習以台語背誦的《三字經》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習相遠……」開始傳授。但是過了不久，改成以北京話發音。

在學校，老師告訴我們，從今以後台灣人就是中國人。中國有5,000年的歷史、廣大的錦繡山河，還教我們唱「三民主義，吾黨所宗」的國歌。我們根本不知歌詞是什麼意思，只能照著老師所教的，跟著拼命地唱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18歲負笈日本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59。

對於那個年代以上不懂得中文的人來說，日常生活使用日語到底還是習慣些。在台灣屬於那個年代的著名作家，如陳千武先生、鍾肇政先生等，在戰後的創作突然得用中文表現，對他們而言還真是吃足了苦頭。

回想當日本人統治台灣時，禁止人使用台語；中國人來了之後，台語還是被禁。至於說日語，那就更不行了！因為對中國軍隊而言，日本可是敵國啊！

不只在學校被禁止講日語，就連走在路上，要是被中國人聽到用日語交談，被罵得狗血淋頭的事更是時有耳聞。「為什麼講日語？你們是賣國賊啊?!」對那些只會說日語的世代來說，那一段歲月真可謂苦不堪言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18歲負笈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60。

「妳也唱些台灣的歌讓我們聽聽嘛！」直到被人這麼一問時，我才發現什麼是台灣的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雖說從小上教會的關係，會唱台語的聖歌，但會的也僅止於此而已。平常在學校或公共場所，由於大家不說台語，自然也是不唱台語歌曲的。感覺上，台語歌只有在如夜間酒店，或是風月場所那一類的地方才聽得到。久而久之，民眾們就自然被洗腦，認為台灣歌曲是低俗不入流的。

那時班上也有來自香港的同學，邀我一起和他們唱中國歌曲。「大家同是中國人，那就一起唱中國的歌吧！」想想說得也是，確實我也會說中國話。結果就在這樣的想法下，便和他們唱起中國歌曲。

不過和來自香港的留學生稍加相處過後，就可感覺到雖同是來自香港，但他們之中會因自己出生背景的不同，而對自身的身份抱持著不同的認知。對於那些生在香港、長在香港的人而言，他們會說：「我不是中國人，我是香港人！」而從中國本土逃至香港的人，則有強烈的「我是中國人」的意識。

那我生在台灣、長在台灣，為什麼會有自己是中國人的想法？如今回頭看，當然已經很明確地知道我和那些香港來的人是不同的，我是台灣人。只是在當時，對於自己的身分尚未能有明確的意識與分辨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18歲負笈日本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64-65。

能與政治理念與身分認同相同的人結婚，會比較幸福，而施某的夫人陳X珠則是例外。

由於母親擔心我一個人留在日本，所以在臨回台灣前就對世楷說：「以後千惠就麻煩你照顧了。」得到了長輩的許可，母親回台灣以後，世楷便經常來找我。我和他常散步在寬廣的ICU校園中，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。

「我最討厭的東西只有兩個，一個是蔣介石，一個是洗碗。」

一次，世楷這麼對我說。就這樣，他就先講先贏，取得了婚後免洗碗的承諾。但在同時，我也發現了平時表面上看來隨和親切的世楷，其實內心卻很認真堅持，對事物也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70。

我們在台灣同鄉會裡，也會遇到其他的留學生。只不過大家聚在一起，大多只會談論自己將來的計劃、討論如何賺錢等，因為只要談到和台灣有關的話題，就有可能遭到密告，通報到駐日大使館的危險。當時的大使館，是受國民黨所支配，在海外扮演著祕密警察的角色，所監視的對象不只有留學生，還包括所有住在日本的台灣人。

看到留學生們這樣的態度，再拿他們和當時的日本大學生相比，兩者的差距不由得教我感慨。和日本大學生交談，我可以很強烈地感受到他們將國家前途視為是自己的前途，並且認定自己背負著國家的未來。儘管他們不是政治家、企業家，只是一名學生，卻有著挑負起國家未來氣概與責任感。甚至有學生認為戰爭已浪費他們太多的時間，他們現在要更用功，為的就是要追回那段落後的差距。日本大學生們所關心的不只有自己，對國家及社會抱持的責任感令我佩服且訝異。

日本人是這樣努力、認真地考量著國家大事，想快快從戰敗中站起來，讓國家一步步走向更好的發展。回過頭來看我們台灣，我們台灣人又是怎樣呢？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73-74。

一天，世楷帶我到留學於東京大學的黃昭堂先生（現任台灣獨立聯盟總部主席、昭和大學名譽教授、前總統國策顧問）位於大塚的住處。

還記得那天走進屋內，看見那八疊榻榻米大的房間裡擠了五、六名留學生，大家圍著火鍋熱烈地討論著。跟他借洗手間時，發現裡頭居然貼著蔣介石的照片。當著蔣介石面前上廁所，感覺不是很奇怪嗎？好奇之下問他：「為什麼要把照片貼在那種地方？」結果黃昭堂先生的回答是：「這樣每天踢他比較方便！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75。

還有黃昭堂夫人—蓮治女士也過世了。黃昭堂先生身為台灣獨立聯盟主

席，不但對內對外交涉要負起最終的責任，還得在時間、財政窘迫的情況下，咬著牙為推動獨立運動而努力。主席的責任之重，成員們都相當清楚。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家庭內所有的大小事就都落在蓮治女士的身上。但蓮治女士並不為苦，她總是諒解丈夫、全力支持丈夫。蓮治女士罹病後，經常往返台日兩國間的黃昭堂先生，擔心萬一哪天他在往返途中遭遇事故，留下妻子一人，教他於心何忍？於是每每帶著蓮治女士一起坐飛機，而蓮治女士也經常伴隨著夫婿進出，體會丈夫的疼愛之情，一直走到人生的最後一步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76。

台灣人信仰的神很多，但是對台灣土地的聯結性不足，只是一種道聽塗說的神話或稗官野史的中國小說演義而成，對於信仰的教義更是無知到極點，只會跟著拜拜而已，這是恐懼感所引發的虛無效應，台灣人要信仰具有基督精神的 228 英靈。

父親說非基督徒不可，偏偏世楷又不想成為基督徒。理由簡單明瞭，因為台灣的蔣介石、韓國的李承晚、越南的吳廷琰這三個亞洲的獨裁者，每個都自稱是基督徒。不過雖然如此，每個星期天，世楷還是會和我一起上教會。

世楷對這三個亞洲獨裁者自稱是基督徒的事情雖有責難，但因為研讀過台灣近代史，對於在日本統治時代，台灣基督徒不怕強權，一貫秉持與台灣人站在一起的態度，到後來國民政府統治，反對欺壓台灣人人權的姿態始終未改變的事，也相當清楚。

終於有一天，當在教會唸著〈主禱文〉，中間唸到一句「願 的國降臨，願 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」時，世楷告訴我，如果這是基督徒所追求的目標的話，那和他對台灣的心是一樣的。基於這個原因，他願意受洗成為基督徒。

那是在世楷入教以後的事了。台灣的基督教教徒們發表〈人權宣言〉等，並主張「住民的自決權」，成為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先鋒。而發起這項運動的中心人物就是高俊明牧師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78-79。

患難知真情，現在阿扁落難，大家更須情義相挺，這才是政治原則的大是大非。

還記得那是發生在女兒出生後一個禮拜的事。我因為剛生產完，還沒辦法走動，不巧這時候，外子也發高燒，躺在床上動彈不得。剛好大學時代朋

友荒瀨典子和藤澤愛子來探望我；原本要來祝賀我生產的，想不到一進門，看見我們夫婦倆和小嬰兒一起倒在床上，嚇了一跳，趕快套上圍裙，動手洗那堆積如山的尿布，還快手快腳地幫我們做好晚飯。

「我們明天會再來！」說完，兩個人便匆忙離開。她們回家後，我看見桌上擺著兩株水仙花，是她們送給我的賀禮。這讓我想起了渥茲華斯的一段詩：「鑲在海灣旁的一萬株水仙，個個昂著頭，歡喜地雀躍著。」當時那兩株水仙的晶亮純白，直到現在還映在我的眼底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和外子、同志相遇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82。

在我們結婚那年的五月，世楷的父親曾經來東京看我們。為了不讓長輩擔心，我們絕口不談獨立運動的事。就這樣，公公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回去了台灣。隨後，國民黨間諜中有一個叫陳純真的人，因潛入聯盟被發現而受到責問。事後，世楷等人即被控以妨害自由傷害罪，遭到逮捕。「陳純真事件」在報紙上刊出，長輩們這才知道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事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和外子、同志相遇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83。

我父親是個貿易商，警備總司令或調查局的人，有時就會以調查是否有逃漏稅的嫌疑，藉故到我家來。

父親是位非常善良的老百姓，一看見警察上門，總是戰戰兢兢地問：「我的女婿做了什麼事了嗎？」一邊說著，一邊帶他們進來家中坐，然後再奉上一杯茶，暗中探問身在遠方的女兒和女婿是否平安。

至於世楷的父親，因為是位律師，膽子比較大，不怕這種場面。就算警察來敲門，他也只讓他們站在外面，然後對他們說：「有什麼事？我兒子都是個大人了，現在人又在國外，要是有什麼問題，去問大使館！」說完就趕他們走。

每次我父親遭到警察或稅務人員盤問，也會打電話給世楷的父親，商量該怎麼應對。多虧有公公，讓父親至少有個諮商的對象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和外子、同志相遇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85。

海外的台灣獨立運動有著「真情」的感動，現在的台灣建國運動，太多山頭還須團結，才能平順建國。

柳文卿先生是和我們一起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的好朋友。那時候他才剛修完東京教育大學（現在的筑波大學）的碩士課程，和我們一樣被沒收了護照，

而且因為已經不是學生身分，也拿不到留學簽證，必須每個月到入國管理局去辦理簽證延期手續。

3月26日，柳文卿先生像往常一樣，前往位在品川的東京入國管理局，但是卻遲遲沒有回來，他的朋友很擔心，就打電話和世楷聯絡。世楷前往入國管理局，對方卻什麼也不肯說。情急之下，只好像無頭蒼蠅一樣到處找、到處問，最後終於從千葉縣選出來的水野清議員那兒得到消息，告訴我們柳先生被關，並且透露他明天早上九點就會被強制遣送回台灣。

獨立聯盟的朋友們當天晚上就趕忙集結在辦公室，商量計劃著怎麼在柳先生被遣返之前把他救出來。最後決定兵分兩路，一組人往羽田機場出發，另一組人則是到品川和橫濱的入國管理局去。

外子負責開車前往品川的入國管理局；按照計劃，他要埋伏等護送車出現，然後用車去衝撞護送車，讓柳先生上不了飛機。只要遣送回台灣的日子延期一天，大野正男律師就可以在禮拜一的一大早，到東京地方裁判所遞出強制遣返執行停止命令。大野正男律師後來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，當時的他不但從未計較過律師費用，有多少拿多少，還對著束手無策的我們，兩手壓在桌上，鞠著躬說：「很抱歉，日本政府做了這樣的事。」

世楷在入國管理局門外等了又等，就是不見押送柳先生的車子出現。原來他們已經在前一晚偷偷地將他送到機場的拘留室了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91-92。

我們後來才知道，事實上在此之前，日本政府早就和台灣政府談好交換條件。當時位在長崎的難民收容所裡關著 100 多名的台灣毒販，日本政府有意將他們引回台灣，但是台灣方面就順勢要求，在引渡回台灣的人犯當中，一定得包括在日本從事反政府運動的人員，台灣才願意接受這些毒販。不得已，日本政府只好答應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和外子、同志相遇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92。

台灣政府處理完柳文卿先生之後，下一個目標就是外子了。隔年，也就是 1969 年，世楷再去辦理簽證更新手續時遭到拒絕。當時正好是世楷來到日本第 10 年，繼早稻田大學碩士學位之後，取得了東京大學博士學位，剛成為津田塾大學助教授的時候。原本還慶幸著從此可以走出不安定的學生生活，誰知道又遭遇到這樣的難關。

1969 年 10 月 13 日，我們接到來自法務部的通知，要世楷「在兩個禮拜之

內離開日本」。

周遭有許多人為我們擔心，紛紛跑到法務部請託，希望能准許讓世楷留下來。還有人在報紙上投書寫著：「明知道有危險還把他送回去，這是無視人權的做法！」認識的議員們也到處想辦法，津田塾大學的教授會也出面向法務部陳情，但所得到的回答都是「NO！」

這時候的我，心裡已有覺悟，也做下了決定，如果世楷真的被強制遣返，不管將會受到什麼處置，我都要一起回台灣去。

世楷說，他將會一直講課，直到規定離開的那天為止，所以仍然到學校去。另外，撰寫民法學者我妻榮先生監修的《日本政治裁判史錄》稿子的工作也繼續著。就在法務部所規定的「兩個禮拜」期限前兩、三天，世楷帶已經完成的稿子到我妻先生家中交給他，並且就剩下的部份恐怕無法完成的事向他道歉。

我妻先生問清楚原因後相當吃驚，同時告訴世楷：「明天到法務部八樓來！」

隔天一到法務部，世楷這才知道，原來我妻先生是法務部的特別顧問。我妻先生把常務次長叫來，讓世楷說明事情原委，聽完後便提出要求：「我願意當許先生的保證人，你們再一次重新審理他的居留資格。」

就這樣，在強制遣返日迫在眉睫前，我們意外得救了。

當時我妻先生雖然什麼也沒說，不過幾年後，在《日本政治裁判史錄》出版紀念會上，他告訴我們：

「那件事還真是千鈞一髮，因為台灣政府和日本政府先已有共識，要把你遣返。幸好，在大學時和岸信介君是同班，彼此有交情，打電話跟他說這樣做太不人道了，他也這麼覺得，才答應設法把你留下來。」

而也因為世楷這件個案的關係，除了之前已被遣返的柳文卿以外，其他原本也要遭到遣返的同伴，統統免除被強制送返的命運，順利地逃過一劫。盧千惠著／鄭清譯，2007，「和外子、同志相遇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93-95。

記得唸中學時，我在教會跟著從美國來的宣教師讀《聖經》。有次談論到當時正值狂傲年紀的我們，曾經對究竟有無「奇蹟」這件事提出懷疑。就

在那時，宣教師告訴我們：「所謂的奇蹟，它是集結了眾多人的愛，再加上上帝的愛，所產生不可思議的事。」他那溫和的態度和語調，讓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和外子、同志相遇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95。

更早期的台灣人認同中國，想幫助中國成為民主大國，現在的阿九家屬皆是美國人，而依附中國，坐享兩國的扶持就不顧台灣人民的建國行動，而急於回復到專制中國的懷抱。

話說祖父離開養母家之後，就和哥哥一起工作。有一天他在街角看到一位紅著臉、身材很高的洋人站在那兒吹喇叭。那個人在做什麼呢？好奇之餘，便在那裡停下腳來。「上帝正在找尋走失了的孩子」，突然，那個洋人用不太標準的台語開始說著上帝的故事。這位洋人也就是凱恩貝·慕迪牧師。他說的「放蕩浪子」的故事令祖父很感興趣，同時也覺得這個人說的上帝，應該是可以相信的。就這樣，從此以後祖父便每個星期天都到教會做禮拜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101。

那是我還在唸高中時候的事情，有一天，發現外祖父客廳牆上，掛著一幅上頭署名梁啟超所寫的「行氣如虹」四個大字，就問外祖父：「為什麼會有他的東西呢？」外祖父於是便把他和梁啟超見過面的事情告訴我。

原來外祖父在年輕的時候，是台灣人政治先師林獻堂先生的祕書。說到林獻堂的貢獻，他曾設立「台灣同化會」，為求台灣人也能享有和在台日本人相同的權利；又不遺餘力地推動台灣議會設置運動；要求對台灣總督所發布條例及編列的預算擁有審議權等。外祖父是在陪同林獻堂先生到日本時，在京都和清朝改革派，當時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先生會面。

原本以為自己會講中文，應該也可以和梁啟超先生溝通的。沒想到，梁啟超先生的中文裡有著濃濃的廣東口音，外祖父怎麼聽也聽不懂。

「我想我的中文裡也有嚴重的台語腔，梁先生也是聽不懂。最後我們只好用筆談。」

後來，林獻堂先生曾經請梁啟超先生來台灣，商計台灣的出路，但是得到的回答是：「現在的中國已經沒有力氣去管台灣的事了，台灣人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考量未來的前途，我們什麼忙也幫不上。」

從前在學校裡曾經學過「梁啟超是清朝末年的改革派」，如今聽外祖父說著實際和他會面的情形，讓我十分感興趣。而平常一向不曾和孫子們和顏悅色地講話的外祖父，意外地能跟孫子談起自己年輕時的重要回憶，那時的外祖父看得出來相當高興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2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03-104。

有 guts 的民主家族，會做正確的選擇，知識份子讀了許多書，要比一般人能自覺自悟，而讀哈佛的阿九呢？

許世楷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，當年都從事過抗日運動。至於世楷父親許乃邦，先是在京都大學法學部就讀，畢業後又進入東京大學經濟學部；司法考試及格後，在東京擔任律師工作，之後又回到台中當律師。就我們父母的那個時代來看，公公可說是個真正的知識份子。

戰後，公公在台中地方法院擔任推事，那時候的中國人都習慣用賄賂的手法，認為不賄賂，官司就不可能打贏。

有一年，公公家裡送來了一盒中秋月餅，當時是由佣人收下。等公公回家後打開一看，盒子裡裝的根本就不是月餅，而是錢；公公相當生氣，立刻叫來法院警察，把送餅的人抓起來。結果對方還一直辯稱他是「遵照中國式的做法」，哪有什麼錯？！

由於公公是受日本司法教育、個性堅毅正直的人，怎麼也不能認同處處賄賂的中國式作為，所以在「228事件」後，就辭去法官的職務。上了年紀之後，有一段時間曾到美國，還有來日本和我們住在一起。

還記得公公住在日本的那一段時間，每次和公公一起外出，走到車站附近，他一定會掏出錢來說：「這拿去買車票。」

「不用了！爸爸，世楷現在在大學工作，有收入。我來買！」

「不！長輩本來就應該付錢的。」

從這些小事就可以知道，公公真的是個一板一眼的人。

如今「代表處」的官邸，還掛有公公送給我們的掛軸。上面寫著：

欣愉節守志彌堅

這是在 1972 年外子生日時，從台灣寄來的禮物，表示對外子參與獨立運動的支持與聲援。當時上頭的署名為「高見」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2 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108-109。

在當時世楷參加獨立運動的情況下，如果公公在掛軸上用本名，恐怕會招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。署名「高見」，不但比較安全，世楷也一看就知道，可說是兩全齊美。

至於世楷的母親洪金雀，是位醫生，畢業自東京女子醫專。在那個時代，女性同時又是醫生，那真是少之又少。她一直工作到近 70 歲才退休。個性非常開朗的婆婆，在 69 歲因膝蓋疼痛到醫院就醫時，醫生告訴她診斷結果為「老人性關節炎」。她十分不解，還反問醫生：「為什麼是『老人性』呢？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2 位祖父與雙親 各自不同的日本緣份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110。

阿九現在最怕台灣人搞建國，由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理地位不為國際所承認，就強迫台灣人要與中國統一，其態勢越來越明顯，台灣人要自救，只有革命一途，流血的犧牲會是必然的結果。

事件的經過首先要回溯到事件發生前 16 年，也就是 1972 年，外子著手寫下了「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」。當初之所以會寫下草案，主要是想把主張獨立，以及未來計劃要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等訴諸文字，認為以憲法草案的形式呈現會更加適合。

完成後，由台灣獨立運動的日本本部成員一起檢討，加以修改，1975 年在美國的台灣獨立聯盟世界總本部的會議中提案，之後由世楷負責進行重寫作業。

1988 年年底，一天，接到台灣的雜誌社社長鄭南榕先生打來的電話。

「我們想在我們發行的《自由時代》週刊上，發表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。」

「你說的是哪一份草案？」

「前一陣子我們已經從張燦鑒先生那兒拿到草案的影印本了。」

外子認為這個草案是十幾年前的舊東西，現在拿出來似乎不太妥當，而且現在正在進行重寫作業，再過不久就可以完成，外子請鄭南榕先生再等一下。「不！我們等不及了！想要現在馬上就發表！」鄭南榕先生回答。

於是外子只好將已經完成的一半以上部份先傳真給鄭先生，剩下的就在那天夜裡徹夜趕工，隔天一早送過去。

草案刊出後，《自由時代》爆發性地大賣，但也因為這樣，鄭南榕先生在隔年一月遭到檢察署以叛亂罪進行告發。警察命令他出面應訊，他不從。「我就算死也不去，為什麼要逮捕我？台灣應該要有言論自由的！」然後就把自己關在雜誌社裡。

在我的日記裡，這麼記載著當時的事情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回到美麗島的懷抱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14-115。

高等檢察官陳耀能對南榕發出出庭命令書，但南榕不予理會，理由是他覺得自己並沒有理由被傳喚。而他也婉拒了身邊朋友要他暫時逃出台灣的建議，打算和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司法做徹底的對抗。

「生在這個時代，要愛台灣同時就要忍受痛苦。對於一個愛台灣愛到入骨的人來說，只有選擇孤獨的道路。2,000 萬人光是嘆息，並不能軟化獨裁者的心，但是，一個滿載 2 萬人憤怒的示威抗議，卻可以促使獨裁者自制。」南榕在二月號的雜誌上這麼寫著。

之後，警察想要逮捕鄭南榕先生，他說：「我不會活著讓你們抓的！」他在報社準備了一個裝滿的汽油桶，自鎖在編輯室繼續做出版的工作。

他的夫人葉菊蘭女士和高俊明牧師，還有許多人都出面說服他，要他別這麼做。

外子也不斷用電話、傳真和他連繫，甚至告訴他：「如果有出國的打算，一些偷渡所需要的東西，我們都會幫你準備好。」可是鄭南榕先生的意志相當堅定，一點也不動搖。

我則是透過各種管道尋求集體連署簽名，設法展開救濟活動。包括日本的

PEN Club 組織，我也向他們請求協助。

但是就在 4 月 7 日，當著強行衝入企圖逮捕的警察面前，鄭南榕先生點火自焚了。李登輝先生因為才剛就任總統不久，還沒有力量阻止這件事，最終無法救回鄭南榕先生的性命。

雖然這事件的結局令人痛心，但它確實促使了台灣的言論自由向前邁了一大步。站在反政府立場的報紙，用大大的篇幅刊出這則新聞和憲法草案，讓它廣為台灣人所知曉。為爭取言論自由，賭上自己性命的鄭南榕先生，功勞真的很大。

在那以後，李登輝先生在總統任內，對政治犯予以減刑或釋放，並在 1992 年 5 月修正刑法 100 條（內亂罪）。從此以後，言論自由得到保障，黑名單也實際得到解除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回到美麗島的懷抱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17-118。

黑名單的時代又要來臨，我發現各地的情治人員，四處到台灣國的地點收集情報，聽說是「上級」有「交代」，阿九執政又有一批台灣人要被清算鬥爭？

1992 年 10 月 15 日，我終於回到睽違 34 年，對外子來說就是 33 年的台灣。那天在機場，有好幾千人來迎接我們，沒想到陣容居然這麼龐大。我們一邊接受媒體採訪，一邊走出機場；到了機場外，才發現天空正下著小雨。即使如此，還是聚集了許多人，他們都是從台灣各地趕來的群眾。

總算回到故鄉了。我的眼睛因為小雨而濕潤了起來，唇邊也不禁喃喃唸起羅塞提的詩。

請佑那溫暖我心的國土
那片充滿慈愛、讓人心快的土地
未加修飾真心的臉龐
聽來心怡的美麗語言
請接受我的心吧
那最真誠溫柔
我思念的國家啊！請接受我的眼淚吧！

外子臨時在車上演講了起來，由於事前並沒有提出演講申請，警官馬上喊：「停止演講！」不准外子再講下去。擔任總指揮的李應元先生向警察說：「再給他五分鐘，他離別了故鄉 30 多年心中有千萬想說的話。」

當天的記者招待會上，有記者對外子提出詢問：「有人回到國內後因為水土不服，後來又回到國外居所。請問你們適應台灣的生活嗎？」

「我們在生活、語言習慣都不同的異鄉過了 30 多年，在無親無戚的海外結婚、生子。在別人的社會都能立足，占有一席之地了，回到自己的故鄉，我想沒有不習慣的道理。

只是，這塊土地在國民黨的統治下，已經被污染。收取賄賂、自私自利，這些成了台灣人文化的一部份。這樣的文化我不會也不想習慣！要將政治帶往正確的方向，首先就必須要去掉這些惡習。而這也就是我們回來的目的。」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回到美麗島的懷抱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120-122。

這種暴力行為還會再出現，踢台灣人陳水扁總統的暴力份子蘇安生，能成為 10 月 10 日中華民國國慶的貴賓，如是反台灣扁的人「一踢成名」，為阿九所賞識。

為配合 12 月 10 日的聯合國人權日來臨，全體兒童文學班同學正在進行改寫〈世界人權宣言〉的工作，希望把它用孩子們能夠了解、接受的語言表達出來。結果有學生第一句話就問我：「什麼是人權？」我將〈世界人權宣言〉裡的 30 項條文印給他們。拿到宣言後，他們驚訝地問我：「我們可以享有這樣的權利嗎？」「在高中，老師都把學生的信拆開檢查。如果讓孩子們讀到這宣言，學校裡可能就要鬧革命了。」

以下是改寫後的內容。

第一條 我們都是兄弟姐妹，擁有相同受尊重的權利。

第二條 沒有種族、皮膚的顏色、身高、體重、身體有沒有殘缺，或者是男女生的分別。

第三條 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，都有活下去的權利，享受自由和安全的權利。

第四條 人是不可以被買賣，或是當做奴隸的。（在寫這一條時，我們討論到小女孩賣春的事情。雖然宣言上這麼強調，但在原住民社會裡，仍然存有女孩遭到買春、奴隸的情形。）

第十一條 嫌疑犯在還沒確定他的罪之前，不可以被當做犯人對待。（有關這一項，也因為宣言和現實之間落差太大，有些學生不太能明白它的涵義。我向他們解釋：「例如，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有殺人罪嫌的嫌疑犯被戴上手銬、腳鐐的鮮明畫面，其實這是

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的。」)

今天，在大家一起思考、討論下，寫到第十五條，完成了一半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回到美麗島的懷抱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144-145。

今天坐飛機到台中，由張志銘來機場接我們，然後就直接出發前往台中縣前立法委員田再庭先生的辦公室。途中遇到糕餅店的林先生，看他戴著口罩，我問他：「怎麼了？感冒了嗎？」「你們看！」他一邊說，一邊把口罩掀起來給我們看，他的嘴巴周圍都腫了，牙齒也斷了好幾顆。接著他告訴我們，原來在選舉期間，他抓到了一個買票的現行犯，正想把買票的人帶到選舉監察總部時，卻碰到幾個黑道人物把他痛打一頓，劫走了人犯。「簡直無法無天嘛！」林先生說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回到美麗島的懷抱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145。

大量引進陸勞的同時，阿九政權執行阿共政策，想安居在台灣，真不可得。

有時想想，人一生的遭遇還真是不可思議，當年我們的護照被大使館沒收，使得我們 30 年回不了台灣。那時候的大使館，在一般台灣人的印象中，是個可怕的公家機構，惹不起、沒事最好不要靠近的地方，怎麼也沒想到過現在會住在這當年認為是「敵人牙城」的地方，還在這兒工作。

身為代表夫人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帶領東京的福爾摩沙婦女協會。

每個星期四，婦女協會的合唱團「東京的福爾摩沙合唱團」會進行練習。因為成員中許多人都不曾唱過台語歌曲，我便提議：「我們來唱台語歌吧！」所以大家就進行台語歌曲的練習。至於合唱團的團服方式，則是原住民族群之一—泰雅族的服裝。

我們合唱團的拿手歌曲是鄭智仁醫師作詞作曲的「福爾摩沙頌」。

福爾摩沙 咱的夢 咱的愛
親像阿母叫阮的名 搖啊搖啊惜啊惜啊 永遠抱著美麗的夢
福爾摩沙 咱的夢 咱的愛
有咱祖先流過汗 搖啊搖啊惜啊惜啊 永遠抱著美麗的夢
福爾摩沙 咱的夢 咱的愛
無怨無悔來期待 搖啊搖啊惜啊惜啊 永遠抱著美麗的夢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住在白金台的森林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 163-164。

阿美族的歌聽來輕快開朗，然而布農族歌卻有著莊嚴的氣氛。他們平時很少獨唱，而是一邊聽著瀑布聲、小河潺潺流水聲、鳥叫聲，一個人先發一個音，另一個人跟著和音，漸漸地聲音越來越豐富，不同的聲音也跟著加入，然後就在合聲到達最高潮的時候結束。這是他們祈求小米豐收的禱告。

那天，我們婦女協會的成員們準備了一些料理，招待這群布農族合唱團成員們。

令我們驚訝的是，這一團 30 位布農族朋友當中，負責演唱的人竟然會說日語。對方是個 60 幾歲的人，我問他：「你有受過日本教育嗎？」「沒有，但是我的祖父、祖母、爸爸、媽媽交談時都用日語，聽著聽著自然就會說了。」他回答。

事實上，原住民的語言參雜著許多日語，譬如：「電灯（電燈）」「水道（自來水）」「縣庁（縣政府）」等。這些以前沒有的東西，他們往往就直接用日語表示。如果能讓他們來日本留學的話，他們的日語一定學得比一般留學生來得快吧！

為了對婦女協會會員請他們吃飯表示謝意，布農族的長老對我們說：「感謝你們準備這麼多料理，我們人在國外，沒有什麼可以回贈你們，就讓我們唱這八部合音的禱告歌，希望你們也能得到上帝的祝福。」這一番話教我們感動不已。

之後我們也唱起台語歌曲，加入布農族朋友們舞蹈的行列，一同跳舞。

歡迎會到最後，他們說：「我們再跳一曲！」，接著又說：「請想像我們穿著日本和服的樣子。」只見他們的舞者，和著兩位 70 歲阿公、阿媽唱的「莎勇之鐘」，跳起日本舞蹈來了。

「這是日本老師教我們的舞蹈。」他們向我們說明。我並不知道「莎勇之鐘」這首歌，但是外子卻說他知道。

「莎勇之鐘」這首歌是根據一位住在深山中，當時 17 歲泰雅族少女的真實故事所寫出的歌曲。當時村裡有一位身兼警官和老師的日本警察，接到出征命令的通知，要離村下山去。就在村民們幫忙警察將他的行李運到山麓時，在送行行列中的莎勇，卻因為暴風雨河水暴漲的關係，從橋上跌落河中，不幸喪命。

這齣悲劇不久後被刻意編織成一段愛國佳話，後來由李香蘭主演的同名電影，更將此事渲染成無人不曉的故事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「住在白金台的森林」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69-170。

日本人對台灣的情義人人皆知，只有阿九不知，其心中充滿「大中國鬼魂」的邪惡思想。

對台灣大地震伸出援手的日本人

1999年9月21日台灣中部發生大地震，震央在南投縣日月潭附近，恰好是在台灣的正中央位置，規模7.6級，死亡和失蹤人數合計約有2,400人。而從海外第一個火速趕往台灣加入救援的，就是日本的國際緊急援助隊。

地震的當時，我們夫婦倆恰好不在台灣，外子到紐約演講，我則是到日本探訪女兒。

那時有朋友從台灣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：「你們最好晚一點再回來，我去看過你們家，附近道路隆起，根本沒辦法接近，而且現在也停水停電。」

雖然我們沒有實際經歷這場大地震，但在之後看到大樓倒塌的景象，可以想見這場災難有多麼地嚴重。

大地震過後一天，外子到醫院做健康檢查，當他坐在台中一家醫院候診室的長椅上等待接受檢查時，只是稍微晃動一下膝蓋，馬上就嚇著了坐在旁邊的人，還以為大地震又來了。親身經歷過大地震的人們，變得受不得一點驚嚇。

在從世界各國趕往台灣的救援隊中，台灣人對當時日本救援隊的表現，可以說是打從心底地稱讚和感激。為了不耽誤救援的黃金時間，他們一抵達台灣，連下榻的飯店都沒先去，直接就趕往現場展開救援行動。另外許多民間的NGO組織和個人義工，也前往現場加入搶救。

日本義工們的認真投入，最教台灣人感動。有些醫師甚至自己手提著沈重的精密機器來到台灣。聽當時在現場的人說，這些日本醫師一大早起床第一件事，就是打掃臨時設置的公用廁所。因為他們深知預防傳染病，也就是避免二次災害，首先要重視的就是衛生管理，而在要求別人也這麼做之前，自己就先做好模範。

還有醫藥品的管理也是井然有序，就連最後要離開前，什麼藥品用多少、剩多少，都清清楚楚地留有記錄。這些舉動看在台灣衛生署的人眼裡，真有說不出的佩服。

另外，也有許多來自日本各方的捐款，還有人主動聯絡探問：「有沒有什麼地方我們可以幫得上忙的？」甚至有人帶來大大捐款箱告訴我們：「這是我們在街頭募得的錢。」最寶貴的還有來自同樣有過大地震經驗的神戶地區各方人士的援助，特別是參與過當初受創最大的神戶市長田區市街重建工程的人員，不斷地與投入南投縣復興工作的人員做交流，對災後重建工作更是有著莫大的幫助。

當有這麼嚴重的災害發生時，看到日本人趕在第一個到來，可見日本人對台灣的關心，同時也深刻地感受到日本人的體恤及和善，教我有說不出的高興。

日本是這樣一個國家，也難怪在本書第一章的問卷調查裡「最尊敬的國家」一項中，日本會拿到第一名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住在白金台的森林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73-175。

1998年，台灣因沒能得到來自WHO的危險通知，造成腸病毒流行，有78名兒童死亡，長期住院的兒童則超過400人；2003年，中國發生SARS，卻因為中國隱瞞病情，讓已受感染的人來到台灣，使得台灣有750人受到感染，37人死亡。那時的台灣，整個陷入SARS的陰影，身旁只要有人稍微咳一聲，就教人緊張恐懼起來。

當時負責國家衛生研究所的前衛生署長李明亮先生帶頭指揮，整整一個月裡，每天三次出現在電視機上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反覆教導全國民眾預防方法，並且毫不隱瞞地每天公布感染和死亡人數。出身於台灣大學醫學院的李先生，在1993年回台灣之前，在美國大學的醫學院教了30年的書，所以深知不隱瞞實情、正確報導的重要性，使得收看電視的民眾從原本的不安，到後來因為相信李醫師不會說謊，產生信賴感，進而也穩住情緒，徹底遵守李醫師所交代的預防方法。

由於台灣在隔離工作以及對WHO的報告，既迅速而且處理適當，當時頗受到日本和美國的肯定。唯一讓WHO覺得困擾的是中國，一直不肯報告實情，就像現在禽流感的流行也一樣，大家對於中國的報告是不是正確？一直多有疑問，懷疑他們不誠實，只報告零星的死亡人數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住在白金台的森林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p.178-179。

台灣的外交，只能在這樣尋找各方人士幫忙牽線下進行。因為沒有正式國與國之間的往來，沒有邦交，只有循著一條條細線，克服一道又一道的難關，好不容易才終於見到想見的人。

外子常說，台灣的外交並不是一場和大家一起站在同一起跑點開始跑的比賽，而是要先經過許許多的努力，才能站上起跑位置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“住在白金台的森林”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，p. 181。

結語：

台灣人無法依靠選舉來建國，執政又如何？不執政又是如何？制憲、正名是條文譊譊的路，而武裝鬥爭會造成血淋淋的廢墟，台灣人要勇於出力、出錢、出聲，必要的流血還是無法避免。

最後摘錄著者的幾句話做為結尾：

不論表層政治的波浪如何，就像在深深的水底一樣，希望台灣和日本之間，能透過文化，長久不斷地維繫下去。

盧千惠著／鄭清清譯，2007，《我心目中的日本》，玉山社。

(撰於 2008/09/30)